

# 我的中医之路

中医

高尔鑫 著

多年来，他集医、教、研、管理多方面工作于一身。在繁忙的工作中，极其重视和关心中医药界年轻人的培养。他认为：“中医要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中医现代化，而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在于高等中医教育的发展和振兴，在于中医现代化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西泠印社 出版社

# 中医之路



高尔鑫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中医之路 / 高尔鑫著.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8-1575-9

I. ①我… II. ①高… III. ①高尔鑫—自传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6033号

## 我的中医之路

高尔鑫 著

---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徐 炜 朱晓莉

责任出版: 李 兵

设计制作: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邮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57 千字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1575-9

定 价: 48.00 元





## 目录

- 第一章 家变致学医 / 1
- 第二章 庐城入杏林 / 8
- 第三章 江城识名医 / 12
- 第四章 医海初学步 / 16
- 第五章 乡野始涉医 / 29
- 第六章 从师习临证 / 44
- 第七章 城乡两栖身 / 63
- 第八章 但愿人皆健 / 68
- 第九章 拳拳挹桃李 / 75
- 第十章 挑战疑难“难” / 91
- 第十一章 虚心求学问 / 98
- 第十二章 群“星”聚鲁滇 / 107
- 第十三章 歧见起波澜 / 116
- 第十四章 矢志守初志 / 120
- 第十五章 缤纷无多彩 / 131
- 第十六章 矩步入“殿堂” / 141
- 第十七章 术业精勤进 / 148
- 第十八章 发心求正觉 / 160
- 第十九章 赤胆革陋习 / 167
- 第二十章 读书修终身 / 174
- 后记 / 179



## 第一章

# 家变致学医

虽然我的家族与中医渊源深厚，但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却是有着另一番故事。漫漫人生路，此生孜孜不怠，行走在探求中国医学真谛的道路上，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出生的 1939 年，正逢乱世，中国大地遭受着日寇铁蹄的践踏。父亲高仲膺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经在湖南、重庆、南京和芜湖等地担任过学校教师和校长等职务。记忆中，我的家一直不断迁徙，我的出生地是湖南吉首的雅溪，湘西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却是在重庆和南京度过。1946 年初，我们全家搬到南京，1949 年又举家迁至安庆，不久又搬到芜湖。尽管生活动荡不安，但是家庭和睦温暖，父母既慈爱又严格的教育，和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是好学上进的学生。1948 年，我的哥哥高尔森考上北京大学文法学院，这成了我们这些弟妹更加努力向上的一个榜样和动力。

我的父亲一生心怀理想，立志教育，同情革命，希望国家变好，百姓免受苦难。1927 年，他在武汉大学生物系读书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曾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出力、办事，保护过身为地下党员的学生，使他们免遭逮捕，并鼓励自己的子女、晚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1957 年，父亲受人诬陷被划为右派，家庭突然发生变故，一下陷入困境。幸好兄姐均已



工作、成家,经济上有他们的支撑,生活尚可维持。然而,当时最困扰全家人的是,有着这种家庭出身的我,能否考上大学?而直接困扰我自己的,则是考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

进入高中,我曾立下学习文学或新闻的志向,且暗自摩拳擦掌,定下自以为可实现的目标:一是报考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或中文系;二是报考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的中文系。这可都是顶级名校、名专业。然而,由于家庭的变故,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这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幻。



但年轻人的狂妄和鲁莽,仍使我在考试结束后,填写了如下的志愿:北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安徽大学中文系。最后一个志愿填上安徽大学中文系,则是出于想保底的无奈。不过,我也做好了考不上大学的准备,并与几个出身不好、同病相怜的同学一起,谋划着自食其力的出路。

1959年8月10日开始,有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接到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跑来向我报喜。当时的我真诚地为他高兴,祝贺他的成功。后来的日子里,被录取的同学都陆续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可算得天南海北,各种专业都有,而我的录取信息却杳无踪影,虽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心凉了一大截。我想:论成绩,我在年级里也算是前茅;论表现,在父亲被划为右派,甚至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后,我仍能努力学习,积极做好团支部和学习班委的工作,也算得上是个可以教育好的青年吧!我真正地不安起来,却又满心不服,决心等个水落石出。

也就在我寝食难安,如热锅上蚂蚁之时,8月18日,邮递员在芜湖市环城西路84号小楼下,大声喊着:“高尔鑫,录取通知书。”我一听到,兴奋



无比，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大门口，接下了一份黄色牛皮纸信封。两眼一瞥，只见信封的右下角印着“安徽中医学院”的字样，霎时，我的脑际间急闪出：录取了，录取在安徽中医学院。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啊。一时间，脑海中浮现出我所知道的老中医的形象：长衫、马褂、瓜皮帽，一双深邃而又深沉的眼睛，从圆圆的老花眼镜的黑色镜框里向外窥视着，特别是那还带着点滑稽笑靥的面容。这顿时使我大大地失去了往日的自尊和自信，满心的兴奋旋即消失，一下子跌入了冰窟窿。心里默念着：“绝对不能进这所学校，即使去拉板车也不能学中医。”如今想来，这念头反映了当年的我对中医是怎样的抵触与不屑。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我必须做出抉择。84号小院子里，也顿时分成了“两派”。房东潘爷爷一家、陆奶奶与她的外孙女剑秋，都站在母亲一边，认为中医是铁饭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潘爷爷更是倍加高兴，他老人家早年是上海滩的一名祖传痔科医生，八年抗战中辗转行医，来到芜湖。因医术高明，解除过很多病人的痛苦，治愈了许多顽症，深受人们的欢迎，那时已是誉满全城的名痔科专家，家业也兴旺发达起来，84号这幢小楼，就是他从家境日窘的陆家爷爷手中盘下的。但潘爷爷一家为人厚道，家境虽较富足，却不为富不仁，不仅与邻居们和睦相处，还经常接济生活艰难的邻里，对一些贫困的农村病人，也常送医施药，不收分文，病人常感激涕零。这些事，我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上，对我后来为医品格的形成影响甚大。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崔先生。她是一名妇产科大夫，抗日战争前毕业于南京的一所高级妇产科学学校，后迁居芜湖，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在离我们家不到两百米的芜湖市镜湖区医院妇产科工作。她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工作认真，对产妇婴儿关怀备至，也是享誉全区和全市的好妇产科大夫。可能是专业的原因，她对我录取在安徽中医学院不以为然。理由是这所学校不怎么样，不就是镜湖医院的前身、解放后办起来的那所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吗！1954年发大水后，搬到了省城合肥，如今大跃进，一下改





成“中医学院”了。崔先生记得没错。怎么会这么巧，老天爷让我录取在诞生于家门口的学校。一种莫名的“缘”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心中：“住于斯、近于斯、学于斯？”难道这是天意，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吗？此后的好几天里，我沉默无语，心里盘算着明年再考。

最了解我的是母亲。母亲出生于清末安徽省安庆城的一个官僚家庭，到我外祖父时已家道中落。外祖父自考上秀才之后，便没能再有进取，青年时期的他就在家一边经营着祖上丢下的数十亩田产，一边继续读书、执教几名学生。俗话说：“做官不成，学医后门。”读书、执教的寒窗岁月里，外祖父每遇困顿，常借翻阅《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之类的医学经典，以为解乏、消遣，天长日久便对医道、医术日渐娴熟起来，每遇邻里和贫寒人家有生灾害病的，常送医济药，很受大家爱戴。最终，外祖父放弃了科考，拾起医书，苦心钻研起来。中年后，外祖父行医在安庆城里已小有名气了。母亲曾说过这样一段故事：外祖父有夜读晚起的习惯，诗词歌赋、医药典籍不离案前，每天晚上必挑灯夜读。民国初年，安庆人已点上了电灯。外祖父则是开着电灯，另外，还要点起煤油灯和“洋蜡烛”，灯火通明地捧卷朗读。他经常对坐在对面的小女儿、我的母亲说起清代张潮的话：“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他还对母亲讲述他自己的“读书观”：“我以为还是‘读’书好，‘读’了易看得专注、‘读’了易印象深刻、‘读’中便有自身思考，这样才读有多得。”

母亲每晚都坐在外祖父的对面，一边跟着读些诗词文章，一边为外祖父沏茶、剔灯、点水烟袋，安排消夜食品，直至深夜才休息。日子久了，母亲也受其影响，跟着读了许多书。我们懂事后，母亲教导我们总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让我最为敬重的是，一部《红楼梦》的诗词歌赋，母亲竟能倒背如流，一些章节能指点其章页所在。当然母亲因频频点烟而学会了抽烟，也养成了深夜才就寝的习惯。父亲一生不沾烟酒，到我们兄弟姐妹也无人抽吸，但饮茶、夜读晚起的习惯则传承至今。





如果哪一天外祖父一大早就起来了,那便是有事发生,必定有贫家亲人亡故,无钱安葬,找上门来,请求捐棺了。外祖父的预感往往很灵验。这些日常事务对母亲影响很深,母亲又转而影响到我们。我因长期伴随母亲生活,帮助料理家务,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认真生活、乐善好施的处世之道;养成了爱整洁、有条理、守信约、不贪财的好习惯。这些对我后来严于律己,认真做学问,当个好医生,影响是深远的。

这一家族渊源,成为母亲坚定不移地主张我就读安徽中医学院的心理支柱。为了帮助我建立对中医的信心,母亲给我讲述了她自己的亲身体会。母亲自幼心脏情况就不太好,30岁上就经常心慌气短。1935年春节之后的一个早上,她正要起床,突然发现自己左侧上下肢动弹不得,麻木得一点感觉都没有。她心里一震:“坏了,这是中风了。”一家人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得知母亲病后,急忙赶回安庆,将母亲送往武汉同仁医院治疗。医院的日本医生说:“这是心脏病引起的脑栓塞,也就是中医所指的半身不遂。除了打针吃药外,只有让她慢慢地恢复。”父亲问能完全恢复吗?日本医生认真地回答道:“说不准,可能左上肢会终生不能自主活动了,也可能会慢慢恢复,但没有完全恢复的把握。”一家人急得没有了主意。这时,父亲想到安庆城里有户世代行医的查氏,当时已传至年轻的查少农医师。查少农医师正值当年,操得一手好金针手法,金质的针灸针具让人神往,便前往请其治疗。母亲在他的精心诊治下,半年的工夫便完全恢复了健康,活动自如,和常人完全一样。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痊愈了。此后,学习自然学科的父亲,也相信中医了。他自己一直很健康,但身边有人生病了,他总会说:“找中医看看。”母亲更是逢人便说:“我半身不遂,就是查少农医生用金针治好的。”



天下难有这么巧的事! 1949年,人民政府在芜湖成立安徽省中医进



修学校，学校就坐落在环城西路我们家斜对面。查少农先生被任命为该进修学校的负责人，边教学，边临床，边主持行政工作。1955年炎夏，我的肚皮上长了一个大疔子，正当肚脐眼上方，肿痛剧烈，彻夜难眠。父亲带我到对面镜湖医院去看西医，医院所在的地方是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的旧址，此时这所学校已迁址省城合肥了。这所医院唯一的当家医生胡剑农，拿了手术刀，迅即在我肚皮上划了一刀，脓血迸出，好不疼痛。一是精神紧张，二是疼痛剧烈，我一下子脸色惨白，全身冷汗，晕了过去。父亲又心疼又惋惜地连声说：“查医生在就好了，他的秘方灵验得很，一张安庆余良卿膏药，再加上一点药粉贴上去，马上就能止痛，不两天就脓溃肿消，几天就能收口，哪要吃这么大的苦。”

后来进了中医学院，认识了查少农老师，听他讲授中药课时，特别用心，但课外很少接触。因为那时他已被划成了右派，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得在药圃里劳动。这使我们这些学生失去了许多请教的机会。1963年冬，在芜湖中医院见习，我把生疔子开刀的事讲给当地名医徐少鳌老先生听，徐老声音高亢而又诙谐地说：“唉，杀鸡何须宰牛刀，几张膏药就解决问题了，如果用中医的法子，你这肚皮上就不会留下这道疤了。”说着笑了起来。至今，每当我触摸到肚皮上这道刀疤时，不免就会想起儿时的故事，想起查少农、徐少鳌两位德艺双馨的老前辈。

这时，远在天津和哈尔滨的兄弟姐妹，连连打来几个电报，督促我：“学中医是个不错的前途，一定要去学校读书，家中生活和你的用度，由我们支撑，去中医学院不能动摇。”我的心开始震动，但问题并没根本解决。

直到母亲利用每十五天一次的探视机会，带我去大荆山采石场探望正在劳动改造的父亲，当见到被苦力活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父亲时，我才真正感到了一种恐惧与绝望的威胁。父亲已全然没了当年身临教坛、执教课堂时的精神抖擞、庄重威严。短短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父亲透过染满粉尘、几近看不到双眼的眼镜，深沉地看着我，老泪纵横，语音微颤地对我说：“尔鑫，家境如此艰难，我何时能够出去还不得而知，这个家要不是你姐姐接





济,怕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能让你进大学,我已十分宽慰了;你也该懂事了,要为家、为你病弱的妈妈分忧了。有学还不上,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父亲两眼流下了混浊的泪水,双唇颤抖着,再没有说下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阵心阻,一阵哽噎。是的,我是再不能让生死都难预料的父亲操心了。我望着父亲,沉重但十分坚定地说:“爸爸,您放心,我去上中医学院就是了。”妈妈虽很难过,她那坚强的内心,此时也渗漏出了些许的欣慰。短暂的十五分钟,拍定了我的人生之路,使我踏入了安徽中医学院的门槛。

几十年后,当一切都面目全非的时刻,面对国家的发展变化,面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我经常想:“是逆境让我成人,是国家和家人让我成了一名不错的中医医生。”





## 第二章 庐城入杏林

省会合肥，坐落在古中原的战场上。一座黄土垒就的土城墙内外，深烙着历史的沧桑。这里曾经发生过撼动中原大地的“淝水之战”、尘埃伴着血腥的“三河大战”。悲壮的故事，如今还在人群中传唱。古城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名人，宋时清官包拯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皖乡的悍将勇士、莘莘学子大多从这里走出，而我是带着一份无奈走进这座城市。

步入了西门城墙脚下方圆不足几十亩地的安徽中医学院校园，正如崔先生说的那样，立在校门外的菜畦间望去，校门简陋狭窄，两边的砖柱上，左边挂着“安徽中医学院”字样的校牌；右边则挂着我曾十分熟悉，但已显得灰黄陈旧、满布斑迹的“安徽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牌子。这似乎验证了我今生一定要来的“缘”。

跨过门槛，放眼看去，是自东向北渐渐隆起的一溜黄土陡坡，这便是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城垣的遗址。它的东面耸立着三四幢红灰相间的楼房。看着这简陋的校园，想到这苦涩的人生起点，不由得想起 1957 年暑假，大哥带我去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观瞻时的情景。我不禁哀叹今生与红楼、与未名湖的无缘！心中沉甸甸的，有些惆怅地猜想着：这般的开始，如何的结局呢……

学院办公室的赵主任，一位看上去年轻而自信的干部，问清我是来校报到的新生时，拿起桌上的照相机，高兴地对我说：“把行李放到边上，站到大门前来，我给你拍张照片，留作纪念；你可是我们安徽省将来的第一批中





医大学生啊!”当时,我笔挺的白衬衫外,穿着一件刚从同学那儿借来的米色夹克外套,看起来十分时髦、精神。于是,我站立在校牌前的碎石路上,背衬古老的城垣,拍下了几张映射我一生的小照。不想40年后,这已发黄的照片,竟被搜集进我自己主持编辑的《安徽中医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册》中。由于“文革”中学院拆并,资料丢失殆尽,它竟成了安徽中医学院建校后的第一张校园照,放在了院史的首册。

中医办大学是件新鲜事。解放前在上海、苏州等地,民间中医曾办过几所中医药院校,由于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终未形成规模和气候,办学事业几近萧条。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医工作,把她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贵



遗产和医药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支持,大力弘扬,使中医药事业得以复苏和发展。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对中医药的需求,1956年,国家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办起了五所中医药高等学校。适逢1958年各项事业的“大跃进”,全国各省也都兴办起中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安徽省中医药进修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因此,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没有教师,便从省内县乡中有些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的医生中挑选而来。教材便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本草纲目》。教材虽为经典,但文字古奥,艰涩难懂;老师又只能照本宣科;再加上我们1959级的学生,来源复杂,卫生技术学校毕业生和年轻的革命干部,合着我们这帮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共聚一堂,同学中医,教与学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毕竟留在安徽中医学院当时那狭小、简陋,教学水平并不算高的院落里学了6年,终于熬到了毕业。6年中,是什么羁绊住了我的心身,让我潜心于学习呢?现在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学中医只有回家拉板车。那时



节对自动离校的学生，社会是歧视的，认为这类学生不是不服从国家分配，就是犯了错误，而且后一种判断占绝对上风。社会看法如此，哪还能指望依靠街道介绍工作呢？更何况像我们这些被涂黑了的孩子！于是只剩下当“板爷”、拉板车这唯一的出路。体力上的“苦”倒是次要，我自觉受不了那种心理上的“苦”，当然也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动弃学了。

另一个原因则缘于开学第一课。

第一课上的第一本教科书是《黄帝内经选读》，第一篇是《上古天真论篇第五》。此篇一开始便以广博的气概，深邃的哲理，直白的论断，清晰的医理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时至今日，秦德平老师那抑扬顿挫地诵读经文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他操着一口吴敬梓故里的全椒话吟诵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短短数语便道出了从浩瀚之宇宙、天地之万物到一粟之人体，无不遵循着“阴阳之道”这一熠熠生辉的铁律，生长、变化、消亡。人的生老病死，病的诊察治疗，无不与此息息相关，且不可违逆。

当时，我对医学与古代阴阳学说有多少关系的认识尚很模糊，但我从已经阅读过的中国古代文学著述中，稍稍领略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阴阳理论、辩证法则有些粗浅的了解。再加上在我涉生、涉世经验并不饱满的生命中，对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哲学理念，也曾有过一些粗略的体会。如：天阴雨湿的瞬间变化，妈妈便会有头晕、目眩、胸闷、心悸、关节肿痛发作或加重的情况，这经常困扰着她自己和家人。我考大学那会儿，日夜看书复习，六月的夏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为了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坚持看书，便把双腿放进冰凉清澈的井水中，一时间清凉透体，沁入肺腑，心思很快凝集到书本和讲义上，复习效果倍增。几十天的浸泡，让我得以考入大学。但就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没几天，我的双膝和足踝全都红肿、疼痛起来，低烧不退，严重时不能下地走路。这可急坏了母亲，她絮叨着：“说不能双脚泡在井水中看书，要得病的，这不秋后算账了吧。”急忙送我去镜湖医院胡剑农伯伯处。老人一见便诊断为风湿热、风湿性心脏病，让我打油





剂青霉素。20天后，总算低烧退了，关节的红肿热痛也减轻许多。但每遇天变，走路多了，便肿胀、疼痛。

学了中医后，才知道暑天过度贪凉饮冷，阴寒浸渍肌肤，是要得筋骨疼痛且久久难愈的。这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这个风湿病困扰了我许多年，发作时那周身骨节的酸胀苦痛，只有天知道。1960年，自然灾害严重，粮食紧缺。为了填饱肚皮，寒冬腊月、雨雪纷飞的三九天，学校组织学生去寿县吴山庙拉白菜。我和同学们一起，冒着大风雪，拉着大板车，步行60里，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右腿的膝关节一下子红肿疼痛起来，不能再下地走路。返回合肥的路上，我独自坐在大板车上，被十几位男女同学拉着，特别是看着那些瘦弱娇小的女同学，满头满身的浸透着雨和雪，艰难地拉着板车，一步一步地前行时，心中泛涌起无限的愧疚，深深的歉意。心中揣着的不安，让我泪流满面；当然也免不了被批判成资产阶级吃不得苦的少爷作风。直到参加工作后，我下定决心，紧咬牙关服了近90服中药苦水，总算明显好起来。以后的岁月，只要天气变化或不慎受凉，就会有腰腿疼痛发生。母亲和我因关节疼痛的苦衷，竟成了准确的天气预报，被邻里们热议着。这可是天地阴阳与人体病痛的相关体现。

当学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时，中国古代哲学的推理论说，一度让我着迷。简略数言，却包揽了天地宇宙间的不尽变数，推衍出大小、增减、出没、顺逆、内外、上下的阴阳变化和消长，无所不括、无处不在、生生不息的铁律。我为古文字理的凝练，意境的广博，意蕴的丰满，意象的美妙所震撼，当然，也为文章意义的深切、透达、丰富所折服。后来学到《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阴阳离合论》等篇章，不仅让我步入了哲学，走进了自然和人体这一无边无涯的宇宙天堂；同时，也使我越来越贴近并喜欢上了中国古代的医学——中医学。这恐怕是我最终静下了心，读完6年中医课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住了学习中医的我”，更是“医古文留住了我学习中医的心”。





### 第三章 江城识名医



1963年国庆节后，中医基础理论各门课程的学习已基本结束。按照当年教学计划的安排，全班同学进入了临床见习阶段。我和十几个同学被派到芜湖中医院进行临床见习，在那儿，我第一次真实地领略到了中医药的魅力。

对芜湖这座我曾读书10年、工作20年的安徽又一座古老而繁华的城市，我是很有感情的。1949年4月，父亲在安庆谢绝了时任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先生要我们全家同往台湾的邀请。而后，作为杨的“秘书长”，父亲认真地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移交了安徽大学，办妥各项事宜后，便携全家来到芜湖定居。

当时的芜湖中医院，在安徽中医学院尚未建成之前，实际上是全省最大的中医医院，也是学院最具实力的临床基地。她起源于解放后组建的芜湖市中医联合门诊部，由于许多著名从业医师的参加，中医临床业务十分兴旺。在约30余万人口的芜湖市，日门诊量竟达七千人次之多，可见她的存在举足轻重。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中医院条件也较简陋。医院坐落在芜湖市中心繁华的长街、原号称全国三个半药店的半月中药号“张恒春大药店”内。药店1955年前后公私合营了，后来干脆改为药厂，不再做直接的营销活动。中医院的门诊部和简陋的住院部，便分别占据了“张恒春”药号的前堂和后堂。前堂原先是病人抓药的地方，经营各方医生的处方抓药

